

上篇

综合篇

本篇主要阐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理论观点、历史借鉴、模式选择、阶段划分、可持续发展以及适应 21 世纪新形势下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等内容，使读者对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有一个整体上的了解和展望。

第 1 章

导 言——本书理论观点综述

研究现实的中国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不能割断历史。这就必然涉及到对传统的工业革命、工业化、产业革命、产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知识化等诸多理论观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再认识。开篇之初，对此加以梳理、澄清并提出作者的观点，既有利于全书论述的统一和展开，也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的理解。

第 1 节 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再认识

1. 工业革命与工业化

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也译为产业革命）是工业化的开端。早期的工业化是指从 1760 年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些发达国家（英、法、美、德、日、意、苏联等）完成工业化的历史过程。这些早期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起步有早有晚，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后来居上，有的由盛转衰。但总的来说，早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至今都保持了现代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和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经济落后和原来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

家和地区，包括新中国在内，也先后走上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道路，而且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工业化进行得成功或比较成功的叫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进行得迟缓或中途受挫，现在仍在进行工业化的叫做发展中国家；当然还有些工业化至今尚未起步，仍处于农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都要走工业化这条道路。

工业，作为一个社会物质生产部门，是人类社会第二次大分工的产物。但它几千年来一直以手工技术为基础，即以手工业为其存在的形式，并依附于农业。只是到了工业革命时，情况才有了根本改变。工业革命，就工业本身而言，有两项革命性的变革：其一是以机器技术代替手工技术；其二是以工厂制代替手工工场制，这是适应机器生产技术需要的生产组织和管理上的革命。工业革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生产力，使工业远远超过并取代农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部门，而且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形成 200 多年的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世界工业文明的新时代。

工业化是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是机器大工业逐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从宏观上讲，工业化的目标是变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农业国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工业国。这种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过程，也正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大体上同步发展和同步进行的过程。

2. 产业革命与产业化

与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相联系的还有产业革命和产业化这一对经济概念。如前所述，人们常把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也译成产业革命。这可能是因为 industry 这个词

在英语词义上有工业和产业双重含义，两者是同义词。西方经济学中使用的工业革命、工业化以及产业革命、产业化等概念，其含义比较混乱。难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产业革命辞条一开头就说“它（指产业革命）具备了变幻莫测的特点，以致几乎成为捉摸不定的了”。^①其实对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从而对工业化和产业化是应当加以区别的，否则我们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就难以说清楚。例如，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一经济发展过程的两个侧面，或更形象地比喻为手心手背的关系，但不能认为工业化就等于城市化。这就涉及到工业革命带动而不是代替整个国民经济和诸多产业的革命和大发展，包括生产、建筑、交通、商品流通、金融服务等诸多方面质的变化和大发展，没有这一切就没有历史上的城市化。反过来说，这一切（包括城市化）也推动工业化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

产业革命着眼于国民经济全局，是指各产业（行业）部门广泛采用新技术及由此而引起的产业发展、新产业的出现和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产业化则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组建新的或整合旧的产业组织关系，使各该产业及其所涵盖的企业得到更好的收益和发展。这就同专指工业自身的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工厂制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工业革命，以及逐步使机器大工业和工业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并进而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工业化是不同的。谈到两方面的联系，应当指出的是，直到信息革命之前，历史上历次产业革命都首先是从工业领域开始的，即先发生在某一工业产业的革命，然后带动其他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和大发展，包括 18 世纪中叶开始于英国的纺织工

具革命、蒸汽机革命，而后的动力革命、内燃机发明、电气化、化学化、材料革命、自动控制、核能利用等等。产业革命和产业化是个不断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有着鲜明的技术标志和发展层次，如第一、二、三……次产业革命等。每次产业革命都有新的科学技术领域和新的产业群体出现，都要对原有产业进行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都会使社会的各种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重新配置和整合，进而使社会生产力形成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每次产业革命的广度、深度、对经济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但每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个或几个带头新技术和带头新产业出现，再波及和带动其他产业的改造和发展，并使产业结构的整体得到调整、优化和升级，进而也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3.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辩证关系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近代机器大工业与手工业不同，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它既要求依托共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又要求生产上的专业化和协作，要求相关的生产和作业成组布局，以利于降低成本和增加效益。这就必然使大批工矿企业、大量工业人口高度集中。不仅如此，工业化、机器大工业和工业人口的发展和集中，如前所述还必然带动众多的其他产业（如二、三产业）的发展并吸引大量农业人口从事非农产业。这种二、三产业群体和非农业人口的大量集中，其存在和发展的形式只能是城市，不可能是空旷和分散的农村，只有城市才具有聚集经济和聚集人口的能力

和特征。就是说，工业化及其所带动的产业和人口的内容与城市化的存在形式是相适应的。这种内容与形式相互适应的关系决定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大体同步发展的基本趋势。

第二，矛盾统一的关系。工业化及其所带动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是不同的，不同就存在矛盾。比如说，由于国情和发展的起点不同，由于受到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或者决策机制、利益机制的作用，很可能顾了工业和产业就顾不了城市建设，或者相反。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也很难避免。这种矛盾往往造成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互有超前或滞后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又不能长久持续下去，因为两者是互动的，是互相促进、互相依存的，其基本的趋势是大体上的同步发展。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曾片面强调过工业化，形成不少“有城无市”的工业城市，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矛盾推向极端，不但造成人们生产、生活的诸多困难，也使工业及其应当带动的产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并使整体效益不断下滑。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高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也大力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城市化严重滞后的局面逐渐改观，进而使得整体经济效益逐步提高，工业的主导作用和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也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城乡人民也较多地得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实惠。我们应当、也完全可以处理好工业化与城市化这种矛盾统一的关系。

第 2 节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1.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序性和层次性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按产业主导的顺序来划分，可以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已经开始蓬勃发展的知识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正是工业经济历史阶段的主要内容。三个历史阶段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的有序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水平。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的出现都以前一阶段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不能超越阶段发展。工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之所以首先出现在英国，知识革命和知识经济之所以发端于美国，都有其产生、发展的条件和原因。而且，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一经诞生就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占据一定的历史阶段，非到新条件下产生更强大、更高层次的新的社会生产力取代之时，这一历史阶段都是不可逾越的。这是一条社会生产力自身发展的重要规律。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的不可逾越性正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一规律性决定的。

2. 社会生产力的物质性和科技性

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是指物质生产力，即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除了劳动者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主体之外，

构成社会生产力的还有物质和科技这两个基本要素。物质要素包括投入生产力运作的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等有形实体。科技要素则指知识、信息等无形资产，它也是生产力运作所必需的要素，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前提下，物质要素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小，科技要素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大。这种趋势如果发展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时，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从落后的农业经济能否逾越工业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阶段而径直走向知识经济阶段呢？答案是否定的。以中国为例，由落后的农业大国向工业经济过渡，不仅要建立和改造数以百万计的工厂、矿山和数以万计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还要陆续将几亿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镇）。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环境质量的改善。不经过长期工业化与城市化建立这些物质技术和环境基础，没有塑造和培育出从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径直走向知识经济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些，在中国不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和努力是难以奏效的，也说明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历史阶段的长期性和不可逾越性。认清了这个问题，国人自应少些虚夸和浮躁，多些真抓实干和勤奋敬业的精神。

当然，在树立长期奋斗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还要善于创造和利用科技和改革开放新成果，发挥后发优势，求得在诸多环节和局部的跨越式发展。在地区和产业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这样做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不能重复“一刀切”的历史错误。这样就把需要长期进行的工业化与

城市化的不可逾越性同近期、局部发展的跨越性结合起来了。这正是中国近 20 多年来发展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原因。

3. 中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却不能逾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阶段

众所周知，1949 年建立的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没有采取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而是迅速转向社会主义和改造资本主义的道路，进入国家工业化的新的历史阶段。这条道路，尽管历经曲折，但实践证明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是可行的和成功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想富强必须进行工业化（当时尚缺少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联系的理论认识，较概括的说法就是工业化）。这一点全国上下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党内高层领导曾有过关于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的分歧和探索，包括是较快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先“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仍属资本主义，但由共产党领导），经过很长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②这涉及到是搞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搞资本主义工业化（或者说是很长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事实是，我们很快就明确并实行了绕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的政策，经过很短的过渡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建设，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问题不在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历史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将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向成功之路；问题在于作为社会制度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尽管它能促进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其作用不可小视，但它终归是被生产力所决定的，是被决定的因素。生产关系要适应和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当生产关系失掉了这种适应性，当它不再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束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它就要被打破并被另一种能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所取代。生产关系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推动和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将被否定，只有生产力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生产力具有直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品格和魅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诚如马克思所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③列宁则用更简洁的语言作了如下的概括：“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的过程。”^④根据中国共产党曾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新民主主义实践，在掌握全国政权并坚持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前提下，绕过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只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过渡而径直走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上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已为历史实践所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说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逾越某种生产关系充分发展的阶段，但不能逾越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历史阶段。

第 3 节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 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的共同理想和追求——兼论现代化理论的发展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再到 21 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和追求是什么？是现代化！这是真正的民意所在和民心所向，也是完全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离开这个主题的中国一切阶级、政党、政府和领导人都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都是失败的和错误的。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干革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之后，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是正确的，而偏离这个中心，搞“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等也早为历史实践所证明是完全失败和错误的，必须“拨乱反正”。

但是，什么是现代化？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现代化是个目标，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它自身是发展变化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现代化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一门指导当代建设的科学。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盛行的提法是“国家工业化”；到 60 年代就讲“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了；80 年代之后则讲“三步走现代化战略”。人们不禁会问，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什么关系？现代化是否取代了工业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

一直把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至今人们有时还把发达国家称之为工业化国家。其实，这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将工业革命、工业化同产业革命、产业化相混淆有关，也与对现代化的理解不同有关。如上所述，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和追求。在 20 世纪的 30—40 年代就有许多中国学者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但是，现代化形成为比较系统的理论和科学却是在“二战”后的美国。1951 年 6 月，美国《文化变迁》杂志编辑部举办的学术讨论会的与会者认为，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比较合适的。60 年代美国和西方的许多学者，包括罗斯托、列维、布莱克、埃森斯塔特、维纳、亨廷顿等陆续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现代化研究专著，将现代化的研究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个人诸多方面，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现代化理论。从经济角度来分析仍然可以认为工业化就是现代化，发展中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但这种观点到 70 年代受到了挑战。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用“现代经济增长”取代了工业化的概念，并指出：“在当今发达国家中它（指工业）只占经济活动的一个较小比重……现代经济增长一直是以农业生产商品化和技术现代化为其主要基础的，而不是以工业为其主要基础的。”^⑤在西蒙·库兹涅茨看来，把现代经济增长等同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都是错误的。现代化理论发展到这个时候，它仍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只能解释过去和现在而不能解释未来，例如，已经达到现代水平的工业发达国家今后如何发展？稍后的一批未来学家填补了这个空白。1973 年，被称为面向未来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出版了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80 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出版了《第三次浪潮》。1982 年，美国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约翰·内斯比特出版了《大趋势》。同年，日本经济学家松田米津出版了《信息社会》。80 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英克尔斯访问北京大学，提出现代化的 11 个评价指标和标准（见表 1—1）。^⑥

表 1—1 英格尔斯特指标体系

序号	指 标	标 准	对比 美国发展水平)
1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	3 000 美元以上	3 243 美元 (1964 年)
2	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15% 以下	11% (1929 年)
3	服务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45% 以上	48% (1929 年)
4	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	30% 以下	21% (1929 年)
5	成人识字率	80% 以上	
6	在校大学生占 20—24 岁人口比例	10% ~ 15%	16% * (1945 年)
7	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	1 000 人 以下	780 人 (1960 年)
8	婴儿死亡率	3 % 以下	2.6% (1960 年)
9	人口自然增长率	1 % 以下	1% (1965 年)
10	平均预期寿命	70 岁 以上	70 岁 (1960 年)
11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50% 以上	66% (1960 年)

注：* 指在校大学生数占 18—21 岁人口的比例。

英克尔斯的现代化指标可以视为当代发达国家和地区达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标准。至此，现代化理论通古论今，还贯通了未来，既有大量的定性分析、定性评价，又有了定量分析的指标体系和标准，应当说现代化理论体系比较成熟和完备了。

国内的中国现代化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启动。一批中国学者先是介绍和梳理国外现代化理论，在这个基础上

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已故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先生就先后出版了《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和《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等著作。199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青年学者何传启先生提出“二次现代化”理论,认为第一次现代化是以发展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经典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是以发展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现代化,并认为第二次现代化不是文明进程的终结,将来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现代化等。本书采纳了何先生“二次现代化”的理论观点,并主要着眼于经济现代化,将工业化和城市化视为第一次现代化,将知识经济和信息化视为第二次现代化。本书以后各章节中所说的工业化城市和知识经济均与上述“二次现代化”的理论观点相对应。这样就把工业化、城市化、知识经济、信息化和现代化等概念联系和统一起来了。何先生的后续研究则是由他领导完成的《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1》、《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2》等。在《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1》中就对世界 131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 34 个地区的 28 年(1970—1998 年)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价。这些分析和评价都是按照设定的比较科学的指标体系——进行仔细核算的结果。这就为当代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和发展进一步提供了有学术价值的依据。

总之,中国学者们通过 10 余年来的辛勤努力所取得的现代化理论成果,不仅有力地驳斥了某些西方学者的偏见,充实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科学内容,同时也为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对现代化的共同理想和追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奠定了科学基础。

2.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对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内容、时间估计、阶段划分、途径道路等，历来就有不同观点，而且其差别和变化非常之大。这里仅以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三个历史人物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估计为例，他们的观点如下：

孙中山在其 1919 年所写的《建国方略》中说：“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以推，中国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是矣。”^⑦

毛泽东 1958 年提出“三年基本改变面貌，两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他还做出“第三或第四个五年内赶上美国，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⑧此前他还有过“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估计。^⑨

邓小平 1987 年提出“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⑩

上述说法虽各不相同，但都是指落后的中国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问题。同时也可以看出对现代化有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当代的中国按照邓小平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部署已经完成了前两步战略任务，从 21 世纪

开始正全力以赴地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前进。

进入 21 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达国家正迅速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最近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有的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就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全局而言，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有多大？这都涉及到我们对新世纪、新起点的实际情况的把握问题，不能掉以轻心，不能以笼统的几句话作为研究的依据。

按前述《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1》提供的英克尔斯一同响评价模型的 10 项指标（人均 GNP、农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农业劳动力比重、城市人口比例、医疗服务、婴儿存活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大学普及率等）的核算，1998 年，在世界参评的 131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64 个国家和地区完全或基本实现了第一次现代化，即本书所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占参评国家和地区的 49%，接近半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尚不在这半数之内。但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工业化、城市化的完成程度到底如何？如果以全面完成工业化、城市化指标为 100% 的话，中国 1998 年的完成程度为 73%，高于印度，低于埃及、菲律宾和泰国。同一报告中对 1998 年世界各国第二次现代化即知识经济发展程度，通过相应的指标核算也给出了可以比较的参数。如果以最高水平的瑞典指数为 107 的话，则美国为 106，中国